

2202

永川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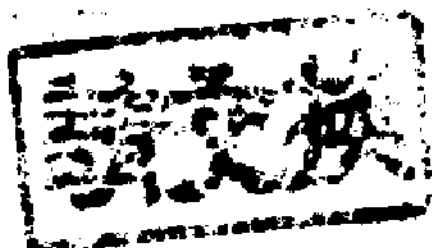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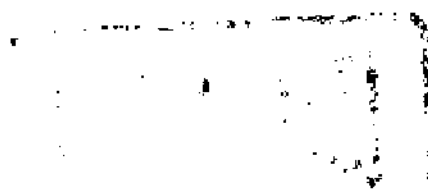
第九輯



永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四川省永川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永川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蒋廷举

副主任:胡尚知 薛锋 钟代华

顾 问:黄恒铤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邓崇仕 旦德煊 李蓝天 宋君良

张义富 邹隐樵 邹权纲 余天潢

林建华 周秀铨 屈景益 钟子夫

彭万钧 谢洪卫

本辑编审人员

主 编:蒋廷举

编 辑:李蓝天

主 审:张明清

审 核:胡尚知 屈景益

校 对:李蓝天 伍济发

目 录

人物春秋

哀悼大哥杜攻.....	杜家翎(1)
黄一德同志	鄢郁文(16)
永川籍黄埔军校学生	邹隐樵(26)
颜孝平老师	帅泽杰(35)
我所了解的张洪昭	何显富(46)

铁路交通

永川修建成渝铁路概况	林建华(50)
回忆修建襄渝铁路片段	马正模(56)

新闻出版

永川的广播电视事业	刘汉福(65)
《九人周报》	张炯和(75)
永川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印刷业	蒋代荣(78)

戏剧活动

歌鼓动山河,洪波弭寇仇.....	余天潢(86)
------------------	---------

永川县川剧团的组建和发展	周世芬(93)
我的三次艺人生活	黄恒铤(104)
从听玩友到打玩友	欧阳琴(114)

教育史料

中山公学开办始末	屈景益(118)
国立第十六中学在永川	李静波(123)
红星幼儿园今昔	刘文璧(127)

医药卫生

永川市中医院之回顾	张致和 邱志云(144)
回忆鑑生堂的医药事业	黄寿筠(157)
江国轩和他的“国济生”药店	宋君良(165)

文物胜迹

黄瓜山崖壁石室考察记	彭万钧 邱世才(168)
永川西北乡汉画像石棺	谢洪卫(173)

剿匪斗争

解放初朱沱最大匪股伍二团	樊汝兴 罗德泰(175)
匪首廖天锡落网记	罗敦才(184)

文史笔记

棠乡旧闻丛谈(续).....	余天潢(198)
永川最早的西医	
杜攻轶事	
难忘血腥恐怖七月半	
杂录.....	张义富(208)
黄大遇与蔡锷	
画家杨鸿坤	
永川万华轩与峨眉山“华严塔”	

更正、补充

我的几点修正、补充意见	郑锡圭(213)
鸣谢赞助.....	文史委(215)

哀悼大哥杜攻

杜家翎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外交战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杜攻，我敬爱的兄长不幸于3月5日病逝北京。17日从大侄信中获此噩耗，心痛肝裂，举家含悲。一月余来，哀思集结胸怀，对大哥的逝世哀惜伤感不已。特作此文，表示深切哀悼。

大哥生于1928年2月12日，卒年刚65岁。出生地为永川城北。据妈妈（即大哥生母，我四岁丧母为她养大，故叫妈妈；大哥称娘）告诉我：大哥生时有群鸟展翼护于屋端，鸣叫不已。伯父即按“全”字辈取名翼全，作为学名，5岁入东高小学。大哥自幼聪颖，他曾微笑地对我说：耀弟，我们来比比看谁背诵的唐诗、宋词最准，输了的就罚请吃“同福元”的鳝鱼面。每次背完书核对，十之有九我都被罚，足见他的记忆惊人了。入学后，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12个学期中共获12个第一。由于学优品端，伯父、妈妈、二爷及亲友们都高兴异常，也深受学校老师、同学的喜爱，并有“神童”之誉。随后升入私立英井初中，三年中，每次考试名列前茅，校长、老师们均视为“奇才”。

初中毕业后,为了争取考入当时驰名全国的南开中学,大哥提前两月赴渝复习功课。当时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各地流亡学生和教师大批迁入四川。其中不少是当时国内外很知名的学者、教授、教育家。他们给青年学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自由、民主与抗日救国的道理。年仅14岁的大哥很快接受了新思潮,贪婪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有次,他给我来信说:为了多获知识,丰富自己,我像一只幼蚕拼命吞噬桑叶一样的读书,经月的刻苦攻读,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

大哥入南开才11个星期,因染初期浸润性肺结核乃回家治病,翌年病愈复学。

1946年秋,大哥考入四川大学。办完入学手续,北京大学才揭榜。大哥录取于西语系第2名,兴奋异常。乃申请保留学籍一年,于1947年秋去北京入学。此一去我们兄弟间竟有近26年没有见面。同时,也开始了大哥一生的革命生涯。

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紊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区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的浪潮迅速展开。国民党不顾人民的呼声,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把战火点燃至整个解放区。继辽沈战役后,平津一带形势很紧张。他在一封信中说:平津局势紧张,学校也不安宁,国民党的特工到处抓人。永川籍同学周裕宽因是学生中的一个头目,已疏散离校。不久,我亦将离校,去向不明……如未收到我的来信,请家内不必担心。此后,通讯中断。直至1950年永川解放才收到他来信。

以后才知道,大哥于1948年6月入解放区,并加入了中国青年民主联盟。在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那时大哥还刚到20岁!他以青年人火热

的激情和对党的赤忱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去。当时党中央已预见到新中国建立后需要一批年轻的外交人才,并筹建了中共中央外事学校,为迎接新政权外交工作作准备。大哥进入该校学习,成为最早的学员之一。从这时起到逝世的40多年,终身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外交事业。他的革命的外交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还须插上一件小事:大哥在北大读书期间,常与在南开时的同学汤一介、杨庆道一起读书学习,也常去图书馆看书。无论在完成作业或历次学科考试,大哥的成绩总是A,有时甚至是A⁺,是同系中的最高分;深得教授、讲师们的好评。因而同学们给大哥取了一个雅号:杜公。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时,大哥即以杜攻二字为名直至逝世。大哥取名“攻”字与“公”字的谐音外,也涵有不断进取,不懈努力攻克的自然之意。

天津是解放前各国侨民聚居的地方,侨民多,情况又复杂。解放后,大哥受外交部的派遣去天津市任外侨事务处外事副科长。年轻的大哥以奔放的革命热情积极地工作,出色地处理了许多外侨事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和表扬。1952年7月,大哥在鲜红的党旗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大哥在来信中激情地写道:入党是我在当学生时代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后,我将更严格要求自己,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光辉的共产主义事业。同时,还勉励我要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大哥、大嫂在京结婚。

1954年大哥偕大嫂被派往缅甸任大使馆二秘工作。在驻缅使馆期间经历了三任大使,即李一氓、耿飚和姚仲明。由于

大哥夫妇工作出色，三任大使都十分赏识和称赞，都把他俩留下，在缅使馆长达 11 年之久。直至 1964 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从东南亚访问归国才与陈副总理同机返国。专机在成都停留了四天。这时大哥来信说：这次本打算回永川一行，由于与陈副总理一起，不便个人单独行动。回永川之行留待以后时日了，请母亲和亲友们鉴谅。

1957 年我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随即又出现三年自然灾害。1960 年伯父病逝。那时我正在大凉山筑路，大哥收到外交部拍的电报，经李一氓大使批准回永办理丧事。丧事毕，大哥即返缅。此时，我家处于极端困难境地。大哥除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予援助外，在政治思想上也不断给予我以鼓励。经我的努力和大哥的帮助于 1963 年 3 月摘掉了右派帽子。帽子摘掉后留下作就业人员，等待就业。两个月后，大哥由驻缅使馆因公回国飞抵重庆，回家看望当时还健在的妈妈。当妈妈见到由国外仆仆风尘归来的儿子时，激动得老泪纵横，捧着、拉着大哥的手不断端详，兴奋得连话都讲不出了，只是问：“翼全，你想吃啥呀，娘给弄去……”，一边说一边流出喜悦的眼泪。大哥连声说：“娘，我不想吃什么，离家多年了，只想吃点皮蛋和豆腐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全家和部分亲友陪同大哥吃了一顿素餐。为了畅叙 18 年的别情，大哥和我作了一次彻夜长谈。我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大哥听了，祝贺我摘帽，并为我高兴，要我继续努力。我们一直谈到晨曦发白，但仍有许多话语未说完哟。此次相聚不到 24 小时直到大哥逝世，整整 20 年未能再相见，谁知这一面竟是永诀呢！

二

1964 年大哥返回北京。不久，即任亚洲司副处长。这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哥和大嫂同时下放到湖南茶山劳动，直到 1971 年中美建交前夕，大哥夫妇才先后被“解放”回京工作。

继中日建交后不久，处于东南亚与台湾邻近的菲律宾拟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韩念龙给大哥一个任务：草拟一份我国对东南亚及与菲律宾建交的报告。不久，部党委在扩大部务会议上通过了这份报告。1975 年 6 月，大哥与另两名外交官作为先遣队员派往菲律宾。6 月，中菲建交，大使馆升起了鲜红的五星国旗。

在菲期间，大哥任大使馆一等秘书和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深入调研，广泛交友，以其广博的学识与儒雅的风度深为菲律宾各界人士广为称赞和推崇。

这时，他来信说：为了搞好调研工作，我要看许多文件、电函、报刊、资料等东西。国外印字都很小，虽配上专门的眼镜，看起来也很吃力……我现在只能写精凝简练的文章，做“节约”文字的工作了。

三

1982 年底，大哥和大嫂返国。1983 年春，即被任命为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在 3 月 28 日的信中告诉我：“由于政研室工作是外交部的‘权力中心’，又是‘敏感性’的工作。因此，处处得小心。如被外国人一了解了这项工作，必然如蚂蚁附膻，前来纠缠不休。前不久，一些国外使馆向我下了不少请帖，

上面都称为阁下，我都婉言谢辞，未敢越雷池一步。”又说：“政研室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使馆的文件、电函太多，真是目不暇接。有如眼观世界，目览全球……满脑子是文电，不仅要看，而且要写，弦蹦得太紧，我感到太累太忙了。”

三年多的政研室工作为大哥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政研室工作涉及面广，遍及全球，范围大，视野更开阔；对世界形势，国际间情况了解得更广泛、更深入。他撰写了不少有益的政策建议，对国际形势中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为部里和中央所采纳。他在信中说：“政研室能起到‘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为中央和领导提供抉择有效的材料，我就感到满足了。”

1985年10月大哥被任命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

但不久，又接大哥来信，说：“我走后，政研室一时尚未找到我的继任人。主管周南副部长不放。因此，我现保持双头衔，成了‘人质’。”结果，大哥延迟至1986年3月才起程赴任，成为我国与意大利建交以来的第5任大使。

上任时，大哥与大嫂同机抵罗马。递交国书后，大哥来信说：“我坐了末班车。”是年2月大哥刚过57岁。

四

从1986年3月到1990年3月，大哥任驻意大利大使共4年另10天。这期间有关他的情况值得回忆和记叙的事太多，只能简略谈一些。

大哥作为一位和平的外交使节，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代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去执行外交使命。任务重，责任大。

行前，他来信告诉我：“前不久，去西欧司了解驻意使馆情况，得知此馆比我过去呆的两个使馆摊子都大，与国内对口的部门多，还加上联合国系统、粮食和农业组织均靠挂使馆内。机构庞大，外交事务之多，出我预料；社交之繁，令人悚然……”又说，“我身为大使，一切都要以身作则。希望你不要以我的名义招摇揽事；不要去作那些沽名钓誉和有损声誉的事。”这些话，我一直牢记，直到大哥逝世，我从未说过、也未做过有损或玷污大哥名声的事。大哥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曾经抵制过个别人讲排场、摆阔气的歪风，还带头反对过公私不分、化公为私与违犯外事纪律等错误行为。现在遇上这样的事，大哥说：我只有“挥泪斩马谡”了。不然会令行不止，会给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对外往来带来巨大的损失。

人们或许认为：身为驻外大使，生活优裕“宦囊充实”了吧。其实，不是人们所想象那样。1990年4月1日，大哥在信中与我写道他和儿子们的关系，说：“我曾对我的儿子以开玩笑的口吻用京剧道白讲了一段话：‘老夫杜攻，膝下无女，单生二子。长子大杜，次子二杜。为官40载，了无积蓄：既无内币，又无外币。眼看年逾花甲，好不伤感人也。’我教子不搞什么个别谈话之类，都以诙谐之琴弦，弹辛酸之心声。这也许是四川人的性格吧。……”

书信是人们内心的剖白，也是最本色、最真实感情的流露。从大哥的信中即完全可以看到一位廉洁奉公的形象了。大哥为“官”40余载，真可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实情如此，绝非虚夸。

从大哥的卧室又是工作室来看，床头、案上尽是书，靠壁的书架装满了书，连装衣服的小橱也装了不少的书。几乎一屋

除了床以外尽是书，这就是大哥留下的财富！

他又说：“人们对外交工作的误解颇多，宣传也不够，人们理解的更少。其实，在外事工作中有许多难言之处，不为人们所知道罢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位高而金低’的，月工资仅二百多元而已。你们听了，也会吃惊。再说，出席什么宴会，我简直是‘食不知味’。别人在饮酒吃饭，我则在打腹稿，致答词，等到讲完话，一一敬酒完时，一切都成了冷餐。”

3月上任，7月份迎来第一件大事，即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李鹏副总理访问意大利。

1986年7月19日，大哥给我的信上写道：

“来此已4个月，前3个月主要干了一事，即为胡总书记的访问作准备。这是一件非常繁重、琐碎、细致的工作，精神压力很大。第一是安全，要打通意大利内政部、国防部、外交部各个关节。记者招待会，那些记者谁能有把握？去威尼斯坐船，水底有什么东西，谁知道？有一点差错就吃不消。”

“其次是日程安排，这是以分钟计算的事。例如第一场接机，就得规定，×时××分专机着陆，谁登机陪同主宾下机。×时××分由谁陪同检阅仪仗队。行至何处向意国旗致意，我是末位，开始沿一条规定的线向前移动，至何处与总书记会合。然后，大使沿什么线穿至总书记右侧，介绍使馆、留学生和华侨代表……把这些具体的规定印成一本可以放进衣袋的小册子里，具体的活动才不至出错。”

“我写这些繁琐的外交礼仪，不是为了别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事外交活动中的艰辛和为外人不知的难处了。但，这些礼仪又是外交上不可避免的。因而它已成国际间的惯例和外交往来不可缺少的隆重礼节了。”

最后,大哥在信中还谈到:

“因为我身为大使,要全程陪同总书记参观、会谈、访问和接见意方和华侨人士。陪同坐车、会谈,准备‘垂询’应答。如果一问三不知,或答非所问,那就糟了。这次是我第一次挑大梁,又是到任3个月,精神压力之重可以想见,正合了一句四川话,‘刚学剃头匠,就遇络腮胡’。”又说,“为总书记和李鹏副总理访意,几乎到了殚精竭智的地步。据与我陪同同车的主要译员告诉别人:杜大使这次在总书记面前考了个‘优’。优则未必,但未挨批挨骂就不错了。”

大哥在意大利任大使4年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给予的任务,没有辜负人民的愿望和重托,把中意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播撒在意大利人民心中了。

作为大使,其主要任务实际是四件:1、对形势的观察研究;2、抓紧经济、外交、贸易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3、宣传自己的国家;4、团结使馆同志,令行禁止,搞好工作……才算不失职。这是他在5月20日信中所写到的几条,他都一一做到。特别是发展中意经济、贸易关系上,中方处于逆差的地位。为了扭转为平衡和顺差,大哥与意方经济界、金融界、实业界等各方面商谈,逐渐扭转了这一势头,出现顺差。意方的中小企业都愿意与我方合作,也愿投资和转让技术。4年中,中意双方各种经济、贸易、文化、艺术、友好团体多层次的往来不断。这些,都倾注了大哥不少的精力。

在使馆内,由于大哥襟怀坦荡,耿介不阿,工作热心负责,诚恳待人,关心同志,因而深受全馆同志的爱戴和敬佩。有次他在信中对我说:

“我从家门跨入校门,由校门步入机关门,是一个‘三门干

部’。乃一介书生耳。现虽为大使，然深知下级同志特别是工勤同志们的辛苦。在涉及经济和物质利益问题上，多关照和体谅他们，多予照顾。”

为此，他私下听到同志们对他的议论是：“杜大使是没有官架子的大使，是外交上的‘明白人’。”这“明白人”的评论是何等的明白，俗话说，鸟过留音，人过留名，4年多的政声、政绩不是明明白白么！由于大哥平易近人，对人热情诚恳，难怪与之共事的周南副部长（已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也称赞大哥是“能团结五湖四海的人”。

五

1990年3月，大哥4年任期届满卸任回国任命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任命的还有中国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副会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委员。即一正两副。随后又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军事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课题组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曾在来信中说：“这个研究所的规模甚大，而且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原所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后调任《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的王殊。钱其琛外长已通知我接替他的工作……此一去，担子更重了。”

到研究所后，大哥深知国际形势调研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依据，懈怠和疏忽不得。因此，他倾注了全部心力和才智，全力推动所内的调研工作，而且身体力行，自己亲自动手撰写研究报告，参加学术讨论和对外交流。

例如,单在1991年6至8月里,大哥先后率团访问了即将剧变的南斯拉夫、波兰和苏联。这些国家的剧变是对国际形势有着重大影响的。恰巧,在剧变的前夕,大哥把目光投向这些国家,并进行了访问和会谈。对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来说还是有远见卓识的吧。

6月27日的信中,他写道:

“6月13日——19日去斯拉夫,时正逢斯洛文尼亚拟于26日宣布独立的时候。南方认为我曾任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意大利大使,是中方的‘巧安排’,对我优礼有加。会谈4个上午,一共4场,心情十分紧张,十分疲劳……每次会谈都以喝土耳其咖啡以支撑疲劳的身体……。”

喝土耳其咖啡的缘故是因大哥刚戒掉了46年吸烟的积习后不久,故以咖啡代之以支撑会谈。6月25日又访问了波兰。

刚写完南斯拉夫局势的情况报告,7月8日至18日,即原苏联“8·19”事件前一个月,大哥又率团访问了苏联。访问期间与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博士进行了会谈。在莫斯科8天,列宁格勒(今称彼得堡)2天,先后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经济部、苏联美国加拿大研究所、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苏联外交部远东局、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双方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并交换了意见。从苏联回来刚一个月即发生了“8·19”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为此,9月,大哥和原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在北京召开了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国际研讨会。11月又去伊朗、朝鲜等国访问。

从这些频繁的出访、会谈、交流等活动中,即可见到大哥